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政府行政价值观之重塑

周恩毅, 党睿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全新的政治理念, 又是全新的囊括社会政治与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现代化行动, 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 并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它对于传统行政价值观是一种严峻挑战。文章试图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出发, 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与政府行政价值观之间相辅相成、同构互益的关系, 其次分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中, 传统行政价值观所显现出的“官本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严重、民主意识薄弱, 重人治、轻法制, 形式主义严重”等诸多问题及原因, 由于其严重阻碍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客观上要求传统行政价值观必须进行调整, 最后尝试从理论、制度、实践和形象方面来重塑政府行政价值观。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 行政价值观; 重塑

中图分类号:D 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7192(2017)02 - 0042 - 07

一、引言

自从2013年11月12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当代中国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定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学术界便掀起了一场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热潮, 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际上“治理”和“现代化”这两个词的概念都是“舶来品”。在1990年西方学术界已经出现治理理论, 美国政治学者罗德里克·罗茨(Roderick A. W. Rhodes, 1996)阐述了六种关于治理的使用方法^[1]。瑞士皮埃尔·德·塞纳克伦斯(Pierre de Senarclens, 1999)认为政府不能完全垄断治理中的所有合法权^[2]。田贝阿特勒—科赫和瑞纳·艾兴(Beate Kohler-Koch & Rainer Eising, 1999)认为治理是利用政策来整合多方的社会利益^[3]¹⁴。英国学者保尔·赫斯特(Paul Hirst, 2000)曾将治理按照治理中心、治理范式、治理区域、治理领域划分为不同类型^[4]¹⁴⁻¹⁹。然而, 从当前西方学术界已有研究来看, 有关“治理”的热议话题主要集中于: “怎样解决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严重、怎样重建对自由市场的信心、怎样

解决西方民主体制的失灵、怎样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共处、如何解决“法治”异化为“律师之治”、怎样进行全面体制创新^[5]。

虽然治理和现代化的概念都是“舶来品”, 但是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国内学者对其研究颇丰, 研究热点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涵义、评价指标、模式、现实障碍、路径选择、法制化等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涵方面尚未形成共识, 俞可平(2014)提出应从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的治理、治理体系的历史根源和当代治理体系的特征这三方面思想观念的转变来解读其内涵^[6]。赵高潮(2014)认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只有在科学的治理制度体系下, 治理的能力才能实现有效的提高; 必须通过提高治理能力, 才可以保证国家治理体系绩效的提升, 通过坚持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更新理念, 顺应历史发展, 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保证党、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7]。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型方面, 张明军(2014)认为, 国家治理模式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政策、法治和民主三方面作为导向的治理^[8]。邵鹏(2014)

收稿日期: 2016-12-13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联2016年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社会网络(互联网)背景下的虚拟社区治理机制研究”(2016Z110)

作者简介: 周恩毅(1963-), 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导,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睿涛(1993-), 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E-mail: 1007510420@qq.com

总结了建国以来,先后形成的全能型国家治理模式与管制型政府的实践,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与管理型政府的实践,以及服务型政府的提出和建设^[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评价指标方面,学者何增利(2014)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维标准是国家有效治理能力和民主法治^[10];学者范逢春等(2014)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三维标准,但前者认为分别为“科学、民主和法治”后者认为“法治化、多元协同和理性化的治理”^[11-12];学者许耀桐、严小龙、刘辉认为四个维度,其中许耀桐认为“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与多元化”^[13];严小龙(2014)的“四化”为结合政党与国家治理、顶层治理与基层,同构制度与价值治理、城市与农村治理^[14];刘辉(2015)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向的四个维度重视秩序、合作、权力共享与政府变革^[15]。相对于传统治理而言,徐勇(2014)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少包括治理的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与协调化这五个要素^[16];杨琛等(2016)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这六方面的治理^[17]。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选择方面,杨光斌(2007)从“观念—行为—绩效”的路径,分析不同国家意识形态与各国治理行为选择之间的影响关系^[18]。陈光等(2014)分析了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与困境,提出了基于现代电子政务改善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19]。

国外对于行政价值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演变类型的展望、对以往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总结等方面。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大师沃尔多(Dwight Waldo)于1948年在其成名作《行政国家》一书中表述了管理主义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选择是如何最终演变为政治偏好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于1887年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行政学研究》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二分法思想),还有其后来分析了公共组织运行过程与行政效率的关系。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倡导者珍妮特V·登哈特(Janet V. Denhardt)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中,通过分析传统公共行政价值观的弊端和新行政价值观的取向,提出把公民置于中心位置的新型行政价值观。国内对于行政价值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政文化方面,如解读其内涵、分析它对行政活动的影响、传统行政文化对当代行政文化构建影响等。陈志龙(2009)针对我

国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在行政权的具体设定和运作问题,重新分析了如何塑造公开行政、阳光行政的理念。徐国伟(2013)认为创新行政文化应该从制度、实践、观念三方面来入手。黄建红(2014)从行政价值观对于行政实践作用入手,阐述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要进行行政价值观的重塑。唐灿琨(2016)研究了在大数据背景下对行政价值观的影响,认为政府行政价值观的提升需要充分利用好大数据潜在的巨大作用^[20]。

综上所述,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研究极其丰富,新角度层出不穷,对于政府行政价值观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然而,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府行政价值观二者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并不多见。因此,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出发来探讨行政价值观的重塑就显得非常必要和有意义。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内涵

1.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目前学术界暂无统一明确概念,学者多数通过和其他概念的比较来解读该内涵,其他学者主要从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不同角度来解读其内涵的。俞可平认为国家治理与国家统治是有区别的:国家治理的权力源于法律,主体多元,强制或协商执行,权力运行自上而下或平行运行,以公共领域为作用范围;而国家统治权力源于法律,主体单一,权力以自上而下运行,以政府权力所及为作用范围。姜明安认为国家治理有五个方面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方式和手段^[21]。方涛认为我国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硕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新论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和突破^[22]。

本文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从内容来讲,国家治理现代化囊括两方面的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治理体系是指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治理能力是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

外交国防,治党治军等各个方面^[23]。“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跟随时代步伐,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不断更新、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条例章程等,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使制度更加科学、合理,实现党、国家、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2. 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内涵

学术界对于行政价值观内涵的研究成果累累,但是至今尚未形成一致认可的观点,对于它的研究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第一种是从人类意识等思想角度入手解读其内涵(竺乾威、彭国甫)认为行政文化由行政的观念、制度和心理组成。第二种观点是从行政主体、客体视角来解释行政文化(张金鉴、李金龙、陈世香),它是行政主体对行政客体、行政活动的主观反映,对行政实践的价值导向和评价准则。第三种观点以颜佳华为代表,行政价值观有三层含义,行政价值的基本观点、问题的独特见地和看法、行政价值观念。

这里特指新型政府行政价值观,就是遵循“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标准,坚持“行政为民、执法为公、服务为本”,坚持以群众为基础,切实做到便民利民、爱民为民、造福人民,着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法制型政党和人民满意的政府,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此作为衡量新型行政价值观实践创新准则,坚持先进性与现实性、时代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发展要求。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1. 政府行政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思想保障

价值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部分,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改革、发展,必然会触动价值观的建构和治理^[24]157-163。首先,因为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包括制度体系,也有价值观治理,所以,政府行政价值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价值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其次,政府行政价值观,是政府行政工作的指向标,是政府精神形象的代表,任何一种国家治理都要在一种价值观的指引下来践行,先进的行政文化价值观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起导向作用。第三,行政价值观是保证国家治理发展方向的前提和

依据,保障国家治理的思想支柱。在正确的行政价值观的指引下才能确保正确的国家治理目标,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意义,对实现大众所认可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政府行政价值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保障,而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处于支配地位,二者相辅相成、同构互益,共同为推进国家发展繁荣提供正确的前进方向和不竭的精神动力。

2.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行政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和制度保障

政府的行政价值观是行政文化的核心部分,集中体现于全体行政人员的行政作风、原则、习惯、目标等共同行为准则,构成行政部门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行政载体来践行,让公众感知、接纳和认可,无疑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彰显政府行政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首先,新型行政价值观,包括民主、法治、责权、高效、服务等理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条标准:程序化、民主化、法治、科学、高效和协调,在内容上二者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效。其次,政府行政价值观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将它内化于国家治理体系,贯穿于国家治理能力,政府行政价值观才可实现其真正的实用价值。而且,所有行政价值观的重塑都依赖于国家政治权力的保驾护航,对其进行有力彰显、弘扬传播、贯彻执行,政府行政价值观也不例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培育和弘扬政府行政价值观的重要实现形式和制度保障,能够借助国家政治权力运行的强制性、合法性、权威性,来确保政府行政价值观的落实。第三,只有将政府“软件要素(政府行政价值观)”嵌入到“硬件要素(国家治理体系)”这个强制性的制度中,让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政府行政价值观的责任担当,才可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和重塑政府行政价值观的过程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有机融合、共同发展繁荣。

四、传统行政价值观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1. 存在的问题

(1)“官本位”观念严重。传统的“官本位”的观念依然尚存,即“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缺乏民本行政理念。传统行政

中的一些观点认为自己拥有“行政特权”,是一种有异于常人的特殊利益,这样,他们就会通过种种手段,运用各种关系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产生了权力寻租、腐败问题。同时,与“官本位”相对应的“上行下效,讲人情、托关系,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行为现象突出。然而,这些错误的传统行政观念却成为了部分人当官的理念,一旦大权在握,他们就开始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演化成一种潜规则,歪曲了行政行为的本质。最终导致部分行政系统内部出现“家长制”、“权力寻租”、“长官意志”等不良现象,有的甚至独揽大权、独断专横、危害群众,严重阻碍了民主与法制建设,也成为我国政府规模不断膨胀的重要原因。

(2)重人治,轻法制。传统行政价值观中往往是“重人轻法、以礼入法、礼法并用”,先秦时就有“有治人,无治法”之说。皇权至高无上,强权统治,往往凌驾于公众之上,超越于制度之上,且有调控社会的超法律特权;同时,人治中当权者个人意志就是民众的意志,认为“民可使之不可知之”,导致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民众参与权利,这也导致现代的行政管理重人治,轻法治。这种轻法治现象不仅不利于依法治国,而且还助长了腐败的滋生,败坏了行政廉洁的良好风气。

(3)权力等级森严,民主意识薄弱。传统统治者的权利是基于皇权世袭,而非制度建构,过于重视自身的权威而忽视了民主。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差序格局、上下等级显著,奉行的中庸之道、无为而治等都对构建新型行政文化带来消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法治与人治、为人民服务 and 官本位、等级观念和群众路线、改革创新和封闭保守等观念的矛盾。同时,个别传统行政价值观中一些中庸思想严重,缺乏创新意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等思想,对行政价值观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如注重等级节制,轻公众参与,甚至将行政实践神秘化,造成“机关病”或“衙门作风”,主要表现为政府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缺乏公仆意识和公共服务思想。严格的等级制带来的后果是对上的绝对服从,甚至造成依附型人格“官本位”观念,衍化出森严的等级观念,甚至出现“官有九品、人有九等、官贵民贱”之现象。

2. 原因分析

(1)历史根源——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中国

封建社会基本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为基础,封闭的内陆环境,形成了超稳定的、僵化的思想体系。首先,中国的“情理”规则严重。由于外靠专制王权,内靠血缘关系的这种自然亲缘和人伦关系构成了“熟人社会”,血缘、地缘、宗族等关系构成的中国的“情理”规则。个体对于宗族的依附跳不出血缘和宗法观念,因此制度规则主要定于“情理”之上,就出现了因人而异、任人唯亲,推崇个人权威、专制体制,从根本上难以实现法治。其次,封建社会和“官本位”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封建社会中君王高度集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推行土地分封制,从中央到地方实行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直接导致了“官本位”。所以,社会上“官本位”的思想就来自于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社会,部分人以入仕为理想为目的,想方设法地求官保官,甚至以官牟私。正因如此,导致这些观念至今仍深远流长地禁锢着一些行政官员,滋长了其高高在上的行政陋习,这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相符合,背离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2)传统管制文化的障碍。传统行政文化有着强烈的人治色彩,主观意识大于法,当权者的意志就是法令,最高皇权没有任何约束力,并且以行政道德规范为支柱,把政治清明寄托于明君贤臣之上,忽视了法规制度约束,严重影响了法治建设。首先,德治的障碍。对德治的内心认同,认为道德万能,产生法治服从道德控制的思想误区,从根本上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信仰,因而对法律的违反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人治思想孵化出了特权观念和腐败现象。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思想,在今天依然存在于一些行政人员头脑中,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法律的制定者和执法者,法律仅仅是为了约束民众,是治民的手段,而自己并不受法律制约。这严重扭曲了法治保护人民利益、维护人民权利的至高追求。最后,鉴于传统行政管理中人治理念,一人独断,唯上是从,极其容易造成腐败的产生和滋长,使服务型政府所贯彻的公平、公正、科学、合理、高效的理念难以践行。

(3)伦理与政治紧密交织。传统行政价值观产生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至今对当代中国行政活动中有所影响,但是传统行政价值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生,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性与局限性。首先,传统行政价值观(上层建筑)

产生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经济基础),为了高度集权、等级森严的封建君主专制长期合法、稳定的需要,历代统治阶级、文人墨客强化了其理论体系,同时辅之以高强度、范围广、长时间的宣传和灌输,内化为一种稳定、持久、牢固的思想意识形态。其次,政治上“阳儒阴法”,强烈的人治色彩,法理调控处在次要的地位,民主意识严重缺失;最后,思想僵化、固化、静定的超稳定思想系统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束缚着民众的思想。如此等等,至今尚影响和制约着少数行政人员的价值评判和行为取向。

五、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行政价值观重塑的路径选择

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基于当前传统行政价值观存在的问题,新型行政价值观建设需要在理论、制度、实践和形象方面进行调整,以便有效适应并快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1. 理论创新是核心

新型行政价值理念要在观念上彻底扫除封建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革固鼎新,重塑行政价值理念。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理念、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科学行政、规范行政、公开行政、阳光行政、高效行政等一系列的新型行政理念。首先,从观念上到行政上弱化权力意识、强化服务意识。政府要转变政府官本位、人治、权利等级、形式主义等传统思想,重新塑造政府依法执政、执法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方面,政府要从人民的实际出发,权为民所赋、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行政官员要增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去除落后的“官”理念和“管”理念,不走僵化的传统行政价值观指引的老路,放下身段为人民服务。其次,提升公民的自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政意识,培育先进的公民文化,形成充分参与性的公民社会,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新型行政价值观。最后,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行政价值观的精华于一体。批判继承中国传统优良行政文化,如注重民心民意,德治教化思想、大一统观念以及大公无私的价值观,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同时,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借鉴国外行政价值观中的民主、法治、自由、公平等优秀行政理念。

2. 制度创新是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行政价值观的重要保障和实现载体,必须将新型行政价值观内化于国民治理现代化中。在重塑行政价值观时,用国家治理将行政价值观凝结于国家治理体系计划、实施、安排、调整等各个环节中,从而实现制度创新。首先,新型行政价值观必须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国家治理过程中用法制手段,大力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社的分开。其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通过实行公开行政,推进公开行政,建立便捷、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办事效率,积极推进和完善横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民众之间的互动机制;同时,加强体系机制建设,推进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透明度,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政治民主程度等。第三,完善惩戒制度、行政问责制、绩效管理机制和监督管理制度,推进合格行政人员队伍的建设。对于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进行严惩,遏制官僚作风,同时对于那些德、能、勤、绩、廉进行考核,并将官员日常服务行为及绩效作为选拔提升干部职位的重要考核指标。另外,要将法律监督与群众舆论监督相结合,防止行政人员滥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

3. 实践创新是关键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行政价值观重塑的关键就是践行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行政价值观的有机融合,着眼于现代化,并以实践为落脚点,将观念(政府行政价值观)具体落实于实践(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首先,由于治理能力就是国家治理者素质和方法方式的现代化,重塑行政价值观就要运用新方法和新途径改变国家治理者的形象素质和行为举止。当前政务公开要寻求技术手段的支持,而电子政府(网上政府)在公开行政的过程中具有革命性意义,善用科技,尤其是充分利用互联网促进政务公开,搭建公共信息平台,实行“一站式”、“窗口式”等政府服务模式,是我国政府行政的努力方向。其一,在行政单位中组织和开展学习新型行政价值观的教育实践活动,并将其作为衡量标尺;其二,将政府新型行政理念的培育融入政府服务的日常工作之中,加大执行力度。其次,选用市场中“企

业家政府”的精神替换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将传统管理理念转变为服务理念,增强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及时性和自觉性,把人民认可作为评价行政工作的重要标准,而且可创造性地汲取先进企业中新型管理理念和方式。最后,拓宽行政监督途径。开通网上评议政府、微博微信、邮件信箱等一切群众监督的途径,让人民切身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

4. 形象创新是重点

政府要用新型行政价值观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让公众重新认可心目中的完美行政主体,即廉洁、高效、法制、民主、有亲和力的政府形象。首先,破除政府现有的不良形象。运用国家治理强制性的法律手段,提升行政人员的素质形象,提高行政人员行政执行力,改变目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走关系、推责任、审批多”等不良现象,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切身体会到政府便民、利民、爱民、为民的新形象。其次,以新型行政价值观为标杆,加强行政官员的整体服务水平和道德水平。其一,在行政人员中开展执行力文化的学习,要求行政人员勤奋学习,掌握专业必备知识,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服务水平;其二,改变陈旧行政观念,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行政价值观,提高行政官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同时,对于少数不良公务员的不良行为如官僚作风、贪污受贿、滥用权力以及贪污受贿等等处理的时候一定要从严从快,必要的时候也要对其追究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最后,政府在与公众的对话、协商和沟通方面要主动,重大问题让人民知情,重大问题与人民协商,充分考虑民情、民意,兼听则明、广开言路,对民智进行广泛的集中之后,落实重大决策,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

六、结 论

行政价值观的重塑是一个动态、复杂的重大工程,必须植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合理扬弃以往的集权制、人治型、权威型的传统行政价值观,建构科学、民主、法治、服务的新型行政价值观。塑造新型行政价值观,国家、政府、社会、公民的共同努力必不可少。行政价值观的重塑必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融合起来,只有将行政价值贯注凝结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贯彻执行于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借助国家治理体系的刚性和国家治理能力的

强制力为重塑行政价值观提供硬支撑和硬约束,行政价值观才能由思想层面落实于具体实践之中,才能展现其鲜活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才能实现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平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 [1] RODERICK A, RHODES W.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 [J]. Political Studies, 1996 (XLIV): 653 - 658.
- [2] 皮埃尔·德·塞纳克伦斯. 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99(1): 92-103.
- [3] KOHLER-KOCH B, EISING 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9.
- [4] PAUL Q, HIRST.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in Jon Pierre ed., Debating Governance: Authority, Steering, and Democrac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 杨士龙. 发达国家走到今天还有社会治理难题吗? [EB/OL]. [2015 - 03 - 14]. 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1734.html.
- [6] 李燕凌.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4(5): 1 - 4.
- [7] 赵高潮.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及途径思考[J]. 人民论坛, 2014(26): 55 - 57.
- [8] 张明军.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选择[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4(5): 16 - 17.
- [9] 邵鹏. 国家治理模式演进与国家治理体系构建[J]. 学习与实践, 2014(1): 66 - 71.
- [10] 何增科.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探微[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4(4): 11 - 14.
- [11] 范逢春.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反思与标准研判[J]. 东南学术, 2014(6): 72 - 76.
- [12] 陈亮, 王彩波. 国家治理现代化: 理论诠释与实践路径[J]. 重庆社会科学, 2014(9): 35 - 42.
- [13] 许耀桐. 第五个现代化: 独特内涵与历史轨迹[J]. 人民论坛, 2014(10): 28 - 30.
- [14] 严小龙.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维结构特征[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4(6): 162 - 166.
- [15] 刘辉.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向: 四维进阶[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145 - 152.
- [16] 徐勇, 吕楠.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话[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4(1): 4 - 10.
- [17] 杨琛, 王宾, 李群.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构建[J]. 长白学刊, 2016(2): 94 - 99.

- [18] 杨光斌,郑伟铭. 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07(4): 31 - 44, 204 - 205.
- [19] 陈光,伍红建,杨一帆. 电子政务: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途径[J]. 电子政务,2014(8):11 - 18.
- [20] 唐灿琨. 大数据对行政价值观的影响研究[J]. 经营管理者,2016(2):309.
- [21] 姜明安.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治理要素的转变[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 42 - 44.
- [22] 方涛. 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历史演进[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4): 30 - 35.
- [23]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EB/OL]. [2014 - 01 - 29].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31/c64094-23993888.html>.
- [24] 段立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J]. 湖北社会科学,2015(4):157 - 163.

Remodeling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ZHOU En-yi, DANG Rui-tao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which is not only a new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also the all new modernization practice in social politics, law and other aspects, indicates that the Party comes to see the law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 new light and as well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deepening the overall reforms, despite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firstly the mutually supplementary and benefic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values. Furthermore, it analyzes issues and factors aris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values in the gradual advancement of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uch problems as the perceived severity of the thought of official standard and hierarchy, the weak awareness of democracy, the great priority given to the rule by men instead of the rule of law, the serious inclination of formalism and so on hinder hugely the progress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or this reason, it is critical to adjust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values objectively and remodel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values in the aspects of theory, system, practice and image especially.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administrative values; remodel

【编辑 程广平】